

踏平坎坷成坦途

——决策澳门回归始末

□ 颜慧

199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在濠江江畔高高飘扬，与莲花相映成辉。回归20年，莲花盛开，越来越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解决澳门问题上的战略远见和智慧。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毛泽东没有踏足香港、澳门一步，却长期关注这两个脱离祖国怀抱的“游子”，为香港、澳门的回归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外交基础。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方法解决。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外交工作指示提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解决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问题，这样“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为处理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申明，对于香港和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等待时机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此之前暂时维持现状。但澳门总督误以为新中国软弱可欺，一而再地发起挑衅。1952年7月，澳门葡兵蓄意挑起“关闸事件”，突袭中国边防军，并用大炮轰击拱北中国居民，遭到中国军民猛烈反击。最后，葡军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并将岗哨撤至关闸澳门一侧，事态才得以平息。

1955年，澳门总督又公开宣称，将澳门改为“澳门省”，并计划举办“澳门开埠40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这一做法，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0月8日，周恩来严厉指出：葡萄牙大规模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葡萄牙最终以经费不足为由取消了这一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针对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冷嘲热讽中国政府不敢武力收回澳门，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回击西方恶语中伤。

1972年3月，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在一份文件中将香港和澳门列入殖民地名单，提请大会讨论通过。对此，中国政府向该委员会提交了备忘录：“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的范畴。”中国政府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由于受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制约，香港、澳门等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的机遇。

责无旁贷，一锤定音

邓小平将香港、澳门回归这一前人未竟之业，视为责无旁贷的历史重

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这些人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澳门问题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1976年秋，时任葡萄牙总统的埃亚内斯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专门磋商。1979年，中葡建交，双方在澳门问题上达成一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

1984年9月，中英在香港问题上达成协议后，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业已成熟。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在谈到澳门问题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是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时再次强调：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同时对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方式和方法作出了原则性阐述。

1985年5月24，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华，在与邓小平见面后，他开门见山地问：移交澳门会不会影响投资？会不会影响澳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会不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邓小平当即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会见结束后，邓小平一反常态，将埃亚内斯礼送出人民大会堂，显示他对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自信。

1986年6月30日，中葡两国正式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澳门回归的具体日期上争议较大。葡方曾一度提出把交还时间推迟到下个世纪。对此，邓小平一锤定音：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对各项协议最后取得一致意见。1988年1月15日，两国政府互换联合声明，澳门从此进入12年的过渡时期。

见证历史，依法治国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第3号主席令颁布。11月28日，江泽民在访问美国、古巴、巴西后深夜抵达葡萄牙，次日与时任总统苏亚雷斯会晤。两国领导人专门就澳门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涉及澳门平稳过渡等有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后，澳门回归步伐进一步加快。1998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名单正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主任委员，澳门委员60人，内地委员40人。针对香港回归后一些港澳黑社会团体损害港澳同胞利益和投资者信心问题，1998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香港回归1周年大会上严厉指出，我们将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而绝不会坐视恶势力的猖獗。这一罕见的语气极大地震慑了澳门的黑社会分子，港澳同胞无不拍手称快。

1999年3月7日，江泽民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充分显示我们党的信心和决心。5月20日，国务院任命何厚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随后，又任命了澳门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至此，澳门回归和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1999年4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正式组建，并于11月10日组建完成。驻澳部队隶属中央军委领导，担负澳门特别行政区防务。1999年12月20日零点，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庄严升起，凝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决策，历经50年酝酿，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澳门这个漂泊在外400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千古雄文 新闻名篇

——南阳解放纪念碑碑文敬读

□ 向东洋

南阳解放纪念碑坐落於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南阳人杰地灵，曾孕育出张衡、张仲景、范蠡、诸葛亮等历史名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名句“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更是让南阳蜚声海内外。南阳是豫西南重镇，自古以来水路交通发达，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一）

1997年元旦，为纪念南阳解放50周年（1948—1998年），南阳市政府经中央批准开始兴建南阳解放广场和纪念碑。南阳解放纪念碑由碑脚、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纪念碑碑脚为六边形图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色彩。碑身高大雄伟，呈六边形棱柱，外饰白色花岗岩。碑座高48米，象征着南阳1948年解放。碑座外形呈五角星图案，从空中俯瞰纪念碑，可以看到一个以五角星为基本图形的勋章图案。碑身正面镌刻原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写的“南阳解放纪念碑”七个金色大字。东西两侧是由汉白玉雕刻的浮雕画面，分为“革命狂飚”“救亡岁月”“胜利凯歌”“辉煌明天”四个主题，展现了南阳辉煌的革命历程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背面刻有毛泽东撰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叙说了南阳解放的传奇，更是为纪念碑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引发后人无限追思。

（二）

1948年11月4日，守敌王凌云弃城南逃，中原解放军占领南阳。一向关心南阳战况的毛泽东闻讯后，戎马倥偬之中，大笔如椽，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热情讴歌了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1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这篇新闻稿，全文如下：

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篡权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

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三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联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联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之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像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窜。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二

（三）

毛泽东的这篇雄文讲的虽然是南阳一城的解放，但绝不拘于一隅，而是以部分引出整体，将解放战争的整个进程全景式地展现出来，堪称综合报道的典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执意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调整策略，向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打到外线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晓东

距有多少、原因在哪里。根本的是要解决问题。始终保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稳扎稳打向前走，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积跬步以至千里，以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解决，赢得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信任，树立党建工作的威信，逐步改变一些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的局面。关键在于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进入新时代，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推进党建工作，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机制等方面加强探索 and 突破，创造性解决新形势下党建工作“船”和“桥”的问题。

斗争意识。所谓斗争意识，本质上讲是敌我意识和阵地意识，既是对敌对势力和风险信号的高度警醒，更是站稳脚跟、防范风险、敢战能胜的深刻自觉。

要始终坚持斗争精神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与各种艰难险阻坚决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会越来越多，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



去的战略构想，解放军顺势展开了战略反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平原；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三路大军成“品”字状，互相策应，挺进中原地区，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武汉和南京，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解放军占领南阳对中原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大别山根据地同豫西解放区连为一体，为中原决战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的南下作战奠定了基础。“得中原者得天下”，在淮海战役前夕胜利解放南阳，在某种意义上，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事关全局，意义重大，因此获悉南阳解放的毛泽东欣然写下了这篇传世名作，让古老的南阳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南阳胜利解放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丰功伟绩，他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值得后世永远铭记。

骇浪。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我们骨头要硬，要敢于出击、敢战能胜。

要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深入整治组织生活简单化娱乐化问题，突出组织生活的政治性。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经常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交锋，敢于较真碰硬、揭短亮丑，及时“清扫灰尘”“杀毒灭菌”（铲除病灶），进一步纯洁队伍、健康肌体。

要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方向，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把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作为考察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要强化实践锻炼，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中心任务、重大斗争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